

试析70年代美国公众的 环境觉醒及其原因

王 曦

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场环境危机日益迫近。这场环境危机的突出表现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环境质量的迅速恶化。在恶化了的生存环境中,美国公众被迫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树立新的环境道德。本文试对这一现象作一粗浅分析。

一、环境危机

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摆脱30年代的萧条和停滞,进入发展时期。随着经济持续高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这种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是以环境质量下降为代价的。40年代以后,美国自然环境承受的来自人类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大。人类环境的各要素——人口、空气、水、土地等方面都显示恶化的迹象。

(一)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

从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人口持续增长。到1972年,增至208百万。在此期间,人口不断地从农村迁往城市。人口向城市急剧集中,导致城市生活条件 and 环境质量日益下降。于是城市人口大量迁往郊区。城市人口外迁造成城区的衰落。那里的治安、卫生和环境等问题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外迁导致郊区的扩大和城市化。城市的扩大破坏了该地自然原有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平衡调节能力。

(二) 空气质量恶化

50年代以后,美国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到60年代末期,每年约有2亿吨主要空气污染物被排放到大气中去。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过高引起的酸雨、城市的光化学雾现象和漂尘皆成危害人民健康和财产的严重问题。

(三) 水体污染严重

自4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农业的现代化和城市的扩大,美国的河流、湖泊、海湾和地下水等水体受到严重的污染。一份资料揭示,在人口密度最大的东北部各州,河流湖泊的平均污染里程占总里程的40%;在五大湖沿岸各州此比例为35%;在农业和牧业发达的北部各州,此比例为42%^①。此外,美国的沿海和地下水的污染情况也很严重。

(四) 土壤质量下降

从大范围上看,战后美国的土质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化肥对农业土地质量的破坏。

另一类土质问题是土壤侵蚀。人为的土壤侵蚀，如农田的土壤侵蚀很严重。

环境污染危及人类生存。到了60年代，美国公众发现自己呼吸的是肮脏的空气，饮用的是污染了的水，吃的是化学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含量过高的食物（如含滴滴涕或放射性物质的牛奶）。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出现了严重问题。

二、公众环境觉醒

（一）圣·巴巴拉海峡石油污染事故的影响

1961年1月2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沿海的圣·巴巴拉海峡，一座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发生井喷，造成严重海洋污染。新闻媒介对此事故作了大量报道。电视屏幕上在浮油层中垂死挣扎的海鸟形象使人们认识到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的人类可以对地球生物的生存带来多大影响。这次事故促使人们把早已察觉的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联系起来思考。环境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和公众舆论的中心话题。

（二）首次地球日纪念活动

自圣·巴巴拉海峡石油污染事故以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越来越强烈。这种强烈担忧酝酿了“地球日”（Earth Day）纪念活动的爆发。

1970年4月22日，首次地球日纪念活动以出乎意料的规模席卷全国。据估计那天参加者的人数至少有两千万人。各种人，从大学生、中学生到商人、州长、国会议员，无不卷入这场席卷全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在地球日活动中，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担忧。

首次地球日纪念活动激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人们纷纷表达对环境问题的见解，试图找出环境危机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环境危机的成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巴里·康门勒（Barry Commoner）教授的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解：一、“人口说”，认为环境污染是人口太多的缘故；二、“富裕说”，认为富裕社会的废弃物太多，还不如虽贫穷但与环境相和谐的穷人社；三、“需求说”，认为污染的原因不在工业界而在公众过旺的物质需求；四、“进取意识说”，认为问题的原因在于人类的内在进取意识，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残忍的物种；五、“教育说”，认为人类所受的教育使人日益变得非人，变得不懂得为什么要爱自然；六、“利润说”，认为原因在于毁坏环境比保护环境更容易获得利润；七、“宗教说”，认为原因在于基督教的自然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信条；八、“技术说”，认为原因在于以赢利为唯一目的的、失去控制的技术发展；九、“政客说”，认为由于制定和执行环境政策的政府机关被亲工业界的政客所把持，使得那些机关瘫痪无力；十、“社会制度说”，认为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②。

在指出上述各种原因的同时，人们提出各种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如控制人口增长、改变生活方式、改良教育、抛弃“利润至上”的原则、改变技术和技术发展方向、改良政府、改革社会制度等等。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即：人们感到了环境危机的威胁，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来摆脱危机。人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办？

首次地球日纪念活动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

首先，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的地位和价值。在这方面，当代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贡献尤值一提。回顾人类伦理的历史，他指出，今天

的人类尚无调整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土地，在今天，仍然仅仅被看做财产。土地关系仍然是严格的经济关系，它所规定的，是权利而非义务。他认为一种新的伦理即“土地伦理”正在出现。所谓土地伦理，就是把原来伦理中的“社会”概念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土壤、水体、植物、动物或者它们的集合体的伦理。土地伦理把人类的作用由土地的征服者改变为它的简单成员或公民。土地伦理要求人类尊重其同伴即自然界的其他组成部分^③。利奥波德所倡导的土地伦理理论得到广泛流传并产生很大影响。与利奥波德同时代的其他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论述也对唤醒人们对自然的地位的认识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加雷特·哈丁（Garrett Hardin）于1968年发表“共有的悲剧”一文。文章阐述公共资源的享用者如何为从公共资源中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而竞相扩大利用资源的规模，导致全体享用者因耗尽该资源而同归于尽的道理。文章提出享用公共资源的“度”的问题，发人深思。莱恩·怀特（Lynn White）于1967年发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文章探讨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西方科学、技术传统对土地的影响。对当时的公众所关注的所有环境问题，如人口问题和各种污染问题，都有专门文章讨论。所有这些著述都要求人们改变传统道德，树立新的尊重自然的道德。

其次，它激起人们对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反思。人们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无内在目标和固定方向，仅仅服从于供需力量的调节。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人类共有的资源如空气、水等，往往被少数人或集团用做换取个人或集团利益的牺牲品。人们还认识到，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应该得到改变。经济发展目标不应该是单纯的高度物质富裕和高度的物质消费，而应该是使人类的发展、繁荣和消费都不破坏自然的平衡、支持力和再生力。

再次，它使人们加深对生态学基本规律的认识。

人们认识到，人类生存于一个巨大的、由各种生物和自然物质所组成的复杂的“生物圈”中。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子系统的变化或紊乱可能对整个生物圈造成巨大的、深远的或长期延迟发生的影响。生物圈或生态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它的内在自我补偿功能的效力。如果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负担或作用力过大，超出了它的自我补偿功能所能调节的程度，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人们认识到，在自然界中，每一种新的有机物的合成必须以存在一种相应的分解酶为条件，否则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便无法继续。但是人类制造了很多自然界原本没有且不能为其提供分解酶的物质，如很多种的化学杀虫剂、防腐剂、洗涤剂、合成纤维、塑料等。这些物质是不可降解的或极难降解的物质，即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归宿的物质。人类往自然界引进在自然界没有归宿的物质的最终后果是破坏自然界的物质平衡。因此，人类在往自然界引入新物质时，必须极其谨慎。否则，自然界的物质平衡和生态平衡可能被过量的无法分解的人工物质所摧毁。

人们还认识到，人类对其征服自然的每一个胜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滴滴涕的发明使人类有了一种对付蚊虫的强大武器。然而，滴滴涕循食物链最终到达人体内。人类终于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征服蚊虫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人类必须反省自己对待自然的行为，重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在发展的同时避免付出过大的代价。

最后，它推动了公众民主意识的发展。在地球日活动中，人们无不大声疾呼保障人的环境权利。人们认为人享有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而法律和政府对这个权利的保障太不充分。人们要求制定和修改法律，加强对污染的控制，要求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

用。人们要求了解政府掌握的有关环境的资料。人们要求参与政府有关环境行动的决策过程，并要求制定法律来保障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

因此，可以说地球日纪念活动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环境意识启蒙运动。它标志美国公众在环境危机中的觉醒。它是美国人环境认识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三）公民环境保护团体的大发展

首次地球日纪念活动激起一场持续至今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关心环境问题的公民组织起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组织。据美国《会社大全》（1987年版）的记载，到1983年为止，美国共有100个全国性的、具有常设办事机构的公民环保团体。此外，还有很多地方性常设公民环保团体和国际环保组织在美国的分部。临时性的公民环保团体更是不计其数。如此众多的公民环保团体，或把一个街区或小镇的居民组织起来，或把一座城市、一个州、几个州、甚至全国的公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或自救、或诉讼、或宣传、或提供咨询、或从事环境立法院外活动，以各种形式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三、公众环境觉醒的原因

如上所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对自然和环境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大陆集团公司和研究预测公司在1982年共同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揭示当代美国人的环境观现状：84%的美国人相信自然的平衡是极其脆弱的和易为人类活动扰乱的；79%的人认为必须防止任何物种的灭绝，即令它意味着美国人和整个人类要为此作出牺牲；76%的人赞同地球是一艘空间和资源都有限的“太空船”的观点；61%的人认为污染是当前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④。其他机构在70年代所做的类似民意测验亦得到类似结果。如果我们把20世纪70年代美国公众的环境观与20世纪以前的美国公众的环境观作一比较，可看到前者正好是后者的反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的环境观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原因何在？笔者试提出以下五点。

（一）生存的需要。

自然生态和环境状况的急剧恶化，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从而迫使人们抛弃旧的环境观，接受新的环境观。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发生在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县罗浮水道地区的废弃化学物污染事件。

罗浮水道原是一条被遗弃的未完工的人工水道，被用做废弃化学物倾倒场。罗浮水道里的废弃化学物对该地居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带来巨大灾难。罗浮水道污染的受害者和罗浮水道居民自救斗争的组织者露易丝·吉布斯（Lois Gibbs）女士有一段话表达了人们对污染危及人类生存的担心：“（人们）所共有的，是一种恐惧和对这个国家管理危险废物的方法的担心。由于他们发现危险废物问题不只是发生在那些有着古怪名称的地方，如罗浮水道、……而且可能发生在他们的后院，这种恐惧和担心事实上已进入他们的家庭……他们越来越害怕，因为他们日益明白这些毒物不仅正在伤害他们自己，而且能够以先天缺陷伤害他们的孩子和引起基因异变伤害其后代^⑤。”

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退化、食品中有毒或有害物质含量的上升和人体内污染物和有毒物质富集量的增加，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日益担心自己的生存。人们终于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十字路口”^⑥。为了挽救自己，人类必须立即改变滥用自然的行为和旧的环境观。

（二）舆论的推动。

20世纪70年代美国关于环境的社会舆论亦走向20世纪以前的社会舆论的反面，即从崇尚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代价到崇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保护环境。这种社会舆论的变化促进公众环境觉悟。社会舆论促进公众环境觉悟的最明显的例子是首次地球日纪念活动。地球日活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宣传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一举成为强大的舆论。环境保护事业成为一项无人公开反对的事业。这种舆论环境无疑有利于人们摒弃旧的环境道德和接受新的环境道德。

（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调节作用

在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认识到“集中的产业权力必须由集中的政府权力管理^⑦。”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以来，美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控制。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是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初以来，美国政府制定了大量政策和法律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在70年代中，环境立法极为活跃。国会制定了一个包括《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水污染控制法》等法规在内的庞大的环境法体系。在国家加强干预和控制的过程中，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所允许的对自然资源 and 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和利用遭到禁止。兼顾经济和环境利益的经济开发和利用行为得到国家的认可和鼓励。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转变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认识。人们认识到自然资源和环境是全民共有的财富，它们不能只被少数人用作追逐利润的牺牲品。人们要求政府对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加强管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调节作用对公众环境觉醒予以巨大的推动。

（四）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比过去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人类活动对自然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使人类更加明白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是公众环境觉醒的科学基础。

现代生态学理论对当代人类的环境觉悟起了巨大促进作用。现代生态学提出了“生物圈”的概念。它把人类作为“生物圈”中的一个成分或因子，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作系统的、全面的考查和研究。现代生态学认为，以现代科技成果武装起来的人类拥有比其他任何物种更强的影响自然的能力。因此，人类必须格外小心自己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

其他科学领域的新发展亦对新环境道德的形成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现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使人类进一步了解地球的过去并更科学地推测未来，进一步明确人类之家——地球在太阳系和宇宙中的地位。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现代化学、现代物理学、现代气象学等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更加了解自然和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人类能够以数学的方式解释甚至模拟客观自然过程。如此等等。

现代技术的新发展为人类认识自然提供新的物质手段，同时也促进人类的环境觉悟。例如，航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在地球之外的太空观察地球。显微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看见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基因。遥感、遥测和分析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全球或局部的环境质量状况。

现代美国一直处在科学理论和技术发展前列。美国人的传统环境道德所受到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冲击比其他国家的公众更加直接和强烈。因此，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的新发展是促成美国公众环境觉醒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一代新人的出现

美国公众环境觉醒的另一个原因是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一代新人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美国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和富裕的国家。这种繁荣和富裕的一个表现是时间和资金的过剩。过剩的时间和资金可为新的事业提供物质条件。同时,这个时候的美国国内已不存在“未开垦的处女地”,对外也没有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需要动员全国力量的大规模战争。这样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为7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准备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当着美国人口中的大多数人不用为衣食住行发愁和国家处于和平时期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要求提高生活质量。这种要求与充斥污染物的生活环境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的现实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强烈地刺激人们反省自己过去对待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并采取行动改变现实。在本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到60年代和70年代进入成年。这一代人与他们的前辈很不相同。他们精力充沛,在政治上很活跃,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

正是这一代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美国人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的群众运动。在这些运动中,环境保护运动是参加者人数最多、时间持续最长的运动。由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公益性,它成为这一代人所普遍关心的事业。70年代初年的首次地球日纪念活动就是以这一代人为主力军,它充分显示这一代人的巨大政治活力。由于有这一代新人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主张和观念才能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如果说公众环境觉醒是必然的话,这一代新人的出现则为这种必然性的早日实现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注释:

- ①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l Ed., Grolier, Inc., 1981, Vol. 28, P. 441d
- ② Barry Commoner, The Closing Circle, Bantam Books, Inc., New York, 1974, p.1—6
- ③ Frederick R. Anderson, et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and Polic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3, P. 10
- ④ The Continental Group Report, Toward Responsible Growth: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the Balance I (The Continental Group, Inc., and Research and Forecasts, Inc., Stamford, CT, 1982) 转引自 Syr. J. Int'l L & Com. Vol. 12: 221, 1985, P. 234
- ⑤ Nicholas Freudenberg, Not in Our Backyards!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84, P. 9, Foreword by Lois M. Gibbs.
- ⑥ Santa Barbara Decla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Annals of Americ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76, Vol. 19, p. 100—101
- ⑦ 伯纳德·施瓦兹著, 徐丙译:《行政法》, 群众出版社, 1986年, 第12页。